airiti

東亞觀念史集刊　第九期
2015 年 12 月　頁 229-286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知識分類觀察：

兩部官修類書的比較分析

項潔[*]、陳麗華[**]、杜協昌[***]、鍾嘉軒[****]

摘　要

本文是運用數位人文方法，分析和比較觀察中國古代大型知識文本的一次嘗試。筆者團隊以唐宋兩部官修大型類書《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爲例，透過建置的「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及「類書對應查詢系統」提供的檢索、分析和觀察功能，具體分析了研究者依靠人力所無法完成的整體分類結構、比重和條目內容的差異，以及兩部類書引用書籍分布時代的分布，嘗試勾勒在中國古代知識結構總體穩定的情況下，唐宋士人知識結構中漸進而深刻的變化軌跡。我們認爲，新工具和方法的應用，目的不是要取代人文學者詮釋性的研究，而是可以爲這一研究提供更爲堅實的實證基礎。

關鍵詞：數位人文、知識分類、類書、文本分析、全文資料庫

---

[*]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兼數位人文中心主任。
[**]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
[***] 作者現任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後研究。
[****] 作者係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碩士。

airiti

Observing the Evolution of Worldview through Digital Humani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Leishu*

Hsiang Jieh, Chen Li-hua, Tu Hsieh-chang, Chung Chia-hsuan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pproach of digital humanities to analyze and compare *leishu*, a unique genre of reference books in ancient China. We have studied and analyzed *Yiwenleju* and *Taipinyulan*, two large scale *leishu* from early Tang (624CE) and early Song (984CE) respectively, and have built two systems to compare the knowledge structures and to provide full-text search. The systems allow us to analyze the sources that each *leishu* selected, under what categories and subjects were they used, the differences of citations and weighting of each category and subject,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overall knowledge structures of the two tomes. To illustrate how the systems are utilized, we provide several examples that show how,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leishu*, one might observe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view among the Chinese elites during those 350 years.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knowledge structure, *leishu*, textual analysis, full-text datadase

airiti

數位人文視野下的知識分類觀察：

兩部官修類書的比較分析*

項潔、陳麗華、杜協昌、鍾嘉軒

一、引言：觀察類書的新視野

面對紛繁複雜的大千世界，人們如何在頭腦中巧妙地搭建起一個完整的架構，將萬事萬物井井有條地安置其中，這是令無數思想史和知識史研究者爲之著迷的問題。在近代西方，將人類古往今來的知識，按照一定的知識結構分類編輯後形成的工具書，便是「百科全書」（encyclopedia）。西方學者曾仔細地比對了啟蒙運動時期法國第一部《百科全書》中確立的知識架構與之前的區別，發現當時的哲學家，透過巧妙地修剪前人留下的「知識樹」，拆解了正統宗教在舊知識秩序中的地位，從而確立了文明和哲人在其新秩序中的重要位置。[1]

*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許多台灣大學數位人文中心和資訊系自動推論與數位典藏實驗室的同仁和同學的幫助，資料庫系統及前人研究中引用書籍數的相關統計，得到了陳思文的大力協助；兩部類書引用地理志書和圖經的情況，則得益於楊筑媛、李沛庭兩位同學的提醒；翁稷安博士在實驗室類書相關的討論裡提出很多意見，亦在此一併致謝。本文曾在科技部人文司中文學門規畫案、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育部「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計畫、科技部「觀念・事件・行動：中國近現代觀念形成與演變的數位人文研究」整合型計畫共同主辦：「從人文到數位人文」國際工作坊宣讀，得到評論人林富士、王三慶兩位先生的批評建議，此外亦在投稿期間得到兩位匿名審查人細緻中肯的意見，這些均

在中國，一種特殊的文本類型——類書，常被近世學者拿來與西方的「百科全書」類比，甚至被西方學者譬喻爲「中國的百科全書」。[2]它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源遠流長，學界一般認爲它起源於公元220年左右，4-5世紀後類書日益盛行，不但隋唐以降成爲國家參與的事業，元、明、清時期更在文人中廣泛流通；近代以來，新型類書的編修亦未停止腳步。[3]然而在性質上，「類書」與「百科全書」存在很大差異，前者是按照「以類相從」的特殊方法編纂出來的書籍，它將社會上常見書籍中的內容摘抄濃縮之後，分門別類地加以重新排列，以便於閱讀和查找。換句話說，它其實是按照設定知識的基本架構，把相關聯的內容編排羅列出來，編輯者隱身幕後，並不直接闡述對於特定主題的看法。而西方的百科全書則不同，乃是由編輯者直接發聲，針對特定的類別和主題，進行具體而主觀的詮釋。

「類書」與「百科全書」的相似之處，則在於二者同樣需要建構一個龐大而體例完整的知識架構，以便對天地萬物進行分類。而這一分類在中國類書中的形成、演變和比較，亦成爲歷代學者極爲感興趣的問題。追溯起來，民國時期便有不少學者，如張滌華（1909-1992）、鄧嗣禹（1905-1988）、胡道靜（1913-2003）等人，對類書進行過綜述性研究。其中除了論述類書的定義、文體、分類、版

對於本文修改有極大助益，謹致上深深謝意。

1 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哲學家修剪知識樹：『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收於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著，呂健忠譯：《貓大屠殺：法國文化史鉤沉》（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年），頁265-298。

2 張滌華：《類書流別》（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43年），頁4；*Qu' 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édie en Chine?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edited by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and Karine Chemla (Saint-Den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3 張滌華：《類書流別》，頁1-33；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22。〔美〕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8、91、150。

本、校勘、輯佚等，已經關注或羅列了歷代類書的分類體系。[4]近年來，學者則逐漸注意到類書分類體系的比較，對於中國古代思想史及歷史書寫研究的意義，如荷蘭學者許里和（Erich Zurcher）便比較過中古時期的佛教類書與官方類書，傅大爲（Fu Daiwie）則比較了宋代兩部大型類書《太平廣記》和《文苑英華》，均試圖發現不同分類方式所反映的世界觀差異。[5]葛兆光以唐初的官修類書《藝文類聚》爲例，分析當時人的一般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6]宋家復關於北宋類書《冊府元龜》的最新研究，與本文的關心最爲接近，他運用史學的方法分析比較了其分類結構與前代類書《修文殿御覽》、《北堂書鈔》以及宋初《太平御覽》之間的關係，同時試圖勾勒建構這一高度精密的分類框架，對於當世人的思維過程所具有的意義。[7]

由於類書的工具書性質及規模過於龐大，除了部類結構之外，學界目前還鮮少嘗試將某部類書的全部內容視爲一個整體，並針對不同時代的類書進行整體性的比較。得益於近年來數位科技的發展，類書全文資料庫的建置和運用已變成可能，歷代學者以往透過經年積累、反覆查找獲得的信息，如今可以透過更爲便利的方式取得。在此基礎上，從整體上重新審視不同類書之間分類結構、資料來源及編排上的差異，由此推敲不同時代編修者知識分類觀念的演變，亦不再是天方夜譚。

本文想要做的，便是這樣的嘗試。我們運用資訊科技，建構兩個

4 張滌華：《類書流別》；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鄧嗣禹：《中國類書目錄初稿》（臺北：古亭書屋，1970 年）。

5 Fu Daiwie: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1269),” in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105-107；〔荷〕許里和（Erich Zurcher）著，李四龍等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二版序言頁 5。

6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21。

7 宋家復：〈從《冊府元龜》論北宋初期類書式歷史書寫操作的典範意義〉，《新史學》第 25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68-94。

airiti

可以用來整體分析《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這兩部中國唐宋時期官修的大型類書的全文系統，分別爲「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以及「類書對應查詢系統」，並透過它們來觀察兩部類書中所反映的唐宋之間高層文人知識分類架構的變化。選擇這兩部類書的理由，在於首先二書均爲新王朝建立之初、集國家之力延攬人力物力編修完成的。《藝文類聚》爲唐王朝統治之後第7年（公元624年），弘文館學士歐陽詢（557-641）等主修；《太平御覽》則在宋王朝建立之後第25年（公元984年），翰林學士李昉（925-996）等主修完成。其次，二者均規模龐大，體制完整，《藝文類聚》更號稱是《太平御覽》編修時主要參考的三部類書之一（另外兩部是南北朝時期北朝編修的《修文殿御覽》，以及唐初編修的《文思博要》）。前者分爲100卷，總計約100萬字，按天、地、人、事、物的次序分46個部，部下再細分734個類別；後者則全書1000卷，部類結構和前者相似，全書分爲55部，5597類，總計達400萬字。第三，兩者既是當時代橫向知識的總整理，亦是縱向歷時知識的總彙編。[8]這類龐大的知識總匯，亦是我們觀察唐宋之際知識架構演變的最佳文本。

本文的結構如下：在第二節中我們敍述對《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這兩部書的文本處理及用處理過的文本所建置的「類書對應查詢系統」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透過這兩個分析和觀察平台，我們在第三節內提出一些對兩部類書的「部」的觀察和比較，第四節也做了對兩書的「目」和條目的比較。第五節則比較兩書引用的書籍。在第六節中我們對以上的工作做了一個總結。

8 按照南宋一位官員稱道後者的說法，其「備天地萬物之理，政教法度之原，理亂興廢之由，道德性命之奧。」李昉等敕撰：《太平御覽》，原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第893冊，頁3。

airiti

二、建置類書分析系統

（一）文本處理和分析

在建構分析系統之前，我們須先對這兩本書的文本做進一步的處理。[9]一部類書會有一個樹狀結構的知識分類，通常這個知識分類至少會有兩層：第一層的大分類叫做「部」，部的下面一層會有一些「目」。《太平御覽》的目下可能會有子目，如「四夷」部下面的「東夷二」裡就有「百濟」、「夫餘」和「新羅」三個子目。這些最下層的目或子目，就是一部類書的「類」，我們也稱之爲「主題」（subjects）。換言之，我們將一本類書知識分類樹的每一個樹葉（leave）定義成一個「類」。根據我們的統計，《藝文類聚》有734個主題，而《太平御覽》則有5597個，是前者的7.5倍。

一個類（主題）下面會有一些「條目」，這些即是針對這個主題從較早書籍中萃取的引文。一個條目通常有「出處」和「內文」兩部分。「出處」顧名思義，就是引文的由來，但出處的書寫方式即使在同一部類書中都不見得一致，有的有作者，有的除了書名外亦有篇章，但有的僅有篇章而省略書名。許多人認爲類書的出處都是書，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以《藝文類聚》來說，所引用的書大約只有一千種上下，而單篇的詩文等則超過4000種。[10]爲了能夠對引文的時間做分析，我們對出處的形成時間做了一些探討，如果成「書」的時間確定，則加入年代；如不確定，但至少知道在什麼時代已經存在，則用「朝代 前」來代表。如《竹書紀年》的成書時代不知，但西晉時已經存在，所以我們用「西晉 前」代表它的年代。

---

[9] 在我們所用的文本中，《藝文類聚》是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紙本建置，《太平御覽》根據的是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建置。全文電子資源來源於國學網（網址：http://www.guoxue.com/），本資料庫去除了其中的註釋。

[10] 關於出處的統計會在下節中較詳細的說明。

經過這樣的整理後，我們算出《藝文類聚》共有 14572 個條目，《太平御覽》則有 65633 個條目，每個條目包含下列資訊：

1.「屬性」：條目所屬的部、目、子目和其前一條目與後一條目。

2.「出處」：條目所屬年代、作者、書名及篇章名。

3.「內文」：條目所引的內容。

在之前的研究中（鍾嘉軒，2013），我們有詳細說明爲了斷出一個條目的出處所設計的自動方法。我們強調在出處的部分，被引的也不見得是一本書籍，可能是一篇文章（或其它文體），朝代與作者可能亦均不詳。

（二）條目間的共引性

爲了分析兩本書之間引用關係的異同，我們需要決定條目間的共引性。所謂共引是指同一段文字在兩部類書中均出現，或在同一部書中不同的類目中出現。但這裡我們要小心，因爲不同傳抄的關係，一段文字、即使是在同一本類書中出現數次，文字也不盡相同。因爲我們的目的是要了解兩個條目是否引自同一出處，所以若兩句的結構、語意以及提到的主詞、動作等皆大致相同，且出於同一本書的同一位置，或文字相同但出處不同，則這兩個條目被視爲共引。反之，即使兩條目文字類似且出於同一本書，如果原書位置不一樣，或所提及的事件不同或無法判斷，則被認定爲不相關。因爲二書中的引文完全相同的並不多，我們採用一個「最長相同子序比較法」（longest common subsequence）的演算法來決定相似度，[11] 用的公式是：

$$\text{共引度}=\frac{\text{LCS 長度}\times 2}{\text{A 句字數}+\text{B 句字數}}$$

其中 LCS 的定義是 A 句和 B 句中共同的最長的子序列。舉例說，在

[11] Thomas H. Cormen, Charles E. Leiserson, Ronald L. Rivest and Clifford Stein, *Introduction to Algorithms (2nd ed.)* (Cambridge: MIT Press and McGraw-Hill, 2001), 350-355.

二書內有以下條目：

藝文類聚 - 布帛部 - 錦目	《漢武帝內傳》：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
太平御覽 - 服用部 - 囊目	《漢武帝內傳》：帝見王母，有一卷書置以紫錦之囊。母曰：此五貞形圖也。

其中共同的最長子序爲「帝見王母有一卷書以紫錦之囊」，長度爲13，而兩個內文字數各爲19 和22，所以相似度爲60.5% 。這兩個條目雖然分屬不同的部目，但其出處和內文均很類似，且在《漢武帝內傳》中出於同一位置，所以被認爲是共引的條目。反之，以下之例：

藝文類聚 - 祥瑞部 - 麟目	《孫卿子》：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麟在郊野。
太平御覽 - 羽族部 - 鳳目	《孫卿子》：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雖然內文的相似度高達78.57%，且出處、文字和結構均相似，然而條目中的關鍵詞不同（麟，鳳），所以不被認爲是共引的條目。[12] 又如：

藝文類聚 - 木部 - 桐目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
太平御覽 - 百卉部 - 萍目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萍始生。

雖然兩者相似度71.43%，但出於《禮記・月令》中兩段不同的文字，所以也被認定是不是共引。

經過實驗，我們發現60% 是一個最佳的界值（threshold）：兩個內文共引度在60% 以上的條目，經人工檢驗的結果，發現超過93%

[12] 條目的處理和共引度的計算，主要見鍾嘉軒：《類書知識分類變化之自動分析與討論：以『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爲例》（臺北：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 年）。

airiti

可認定是共引的（參見表一）。

表一：正常長度條目配對已 LCS 共引度分群的數量分布[13]

	X	Y	Z=X / Y
共引度區段	該區段中經人工檢驗標記爲共引的配對數	該區段中所有的配對數	共引條目配對在這個區段的比率
similarity =100：	763	763	1
100 ＞ similarity ≧ 90：	1779	1779	1
90 ＞ similarity ≧ 80：	1749	1749	1
80 ＞ similarity ≧ 70：	1095	1119	0.978552
70 ＞ similarity ≧ 60：	797	853	0.934349
60 ＞ similarity ≧ 50：	401	519	0.77264
50 ＞ similarity ≧ 40：	145	351	0.413105
40 ＞ similarity ≧ 30：	58	405	0.14321
30 ＞ similarity ≧ 20：	3	485	0.006186
20 ＞ similarity ≧ 10：	0	534	0
10 ＞ similarity ≧ 0：	0	325	0
sum	6790	8882	

（三）長短條目共引度的處理

我們先看以下的例子：

藝文類聚 - 天部 - 天目	《周易》：天行健。
太平御覽 - 天部 - 天部上目	《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這兩個條目應該是有共引關係的，因爲它們出處和引文都類似，但用 LCS 的算法它們的共引度僅爲 46.1% 。這是因爲二書所引內文的長短

[13] 鍾嘉軒：《類書知識分類變化之自動分析與討論：以『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爲例》，頁 28-29。

有時有甚大的差距。爲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用另外一個方法來計算長短句的共引度。

一對條目爲「長短條目」如果其中一條內文的長度至少爲另一條的兩倍，直觀來說一對長短條目被認爲是相關如果短的條目被「包含」在長的條目裡面，亦即如果兩段文字的 LCS 與短的條目很類似。換句話說如果短條目被包含在長句裡的越完整，這兩個條目越可能有關聯。這個觀念換成計算就是先找出兩個條目的 LCS，再用 LCS 的長度除以短條目的長度。如果比例達 80% 以上（80% 是我們經過反覆試驗得出來的最佳值），則認爲這兩個長短條目是有共引關係的。以上述例子而言，其長短條目共引度是 100%，所以這兩個條目被認爲是共引的。

在我們的實驗中先對《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的條目做了兩兩條目間的比對，得到共引度最佳爲 60% 和長短條目共引度最佳爲 80% 的結論，然後再做一個條目對多個條目的比對。由於一對多的計算複雜度太高，我們僅僅對六個目做了完整的求準率（precision）和求全率（recall）的分析，然後用自動方法從事兩部類書完整的條目相關性比較。而以自動條目比對方法將兩部類書完整比對後，所得到的統計數據如下所列：

《太平御覽》條目數：65633 《藝文類聚》條目數：9701（事）＋4871（文）＝14572 《太平御覽》中能在《藝文類聚》找到配對的條目數：11022 《藝文類聚》中能在《太平御覽》找到配對的條目數：7249（事）＋520（文）＝7769 比對判定爲相似的條目配對數量：13071 對

（四）類書分析系統

爲了有效的比較這兩部類書，我們建置了兩個不同的系統，分別是「類書對應查詢系統」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各

有不一樣的目的。

1. 類書對應查詢系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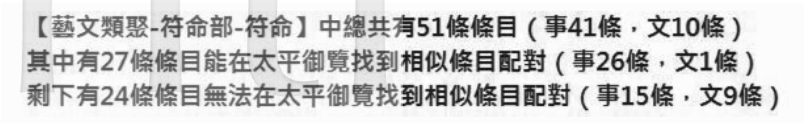
鍾嘉軒建立的「類書對應查詢系統」[14] 利用上述的共引關係，從知識結構的對應角度比較兩部書在知識結構和引文上的差異。研究者可以選擇一部書的某一部或目（子目），利用系統提供的圖示呈現與統計資料，一目瞭然的觀察其中條目在另一部類書中不同知識框架下出現的分布情形。這個資料庫的基本動機，即《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成書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展示的是唐初和宋初知識菁英不盡相同的知識結構，因此透過觀察其中一部類書不同層級部類結構下的條目，在另一部類書中的取捨和所屬部類的分布，可以窺見兩個時代知識結構演變及對特定主題的觀念的變化。

這個系統的輸入界面非常簡單：使用者選擇要觀察的書（《藝文類聚》或《太平御覽》）及部（或部和目／類）（見圖一），選擇送出後，系統就提供該部／目所有條目在另一部書中出現的情形。以下我們用「符命」做例子說明：

圖一：系統——選擇要分析的目標

系統第一個呈現的是：目標部目的條目中，有多少在另一部書中有共引的條目出現。以「符命」爲例，《藝文類聚》中有51 條，其中27 條在《太平御覽》中可以找到共引的條目，其他的24 條則找不到（圖二）。

[14] 網址見 http://leishucis.digital.ntu.edu.tw/，2013 年7 月上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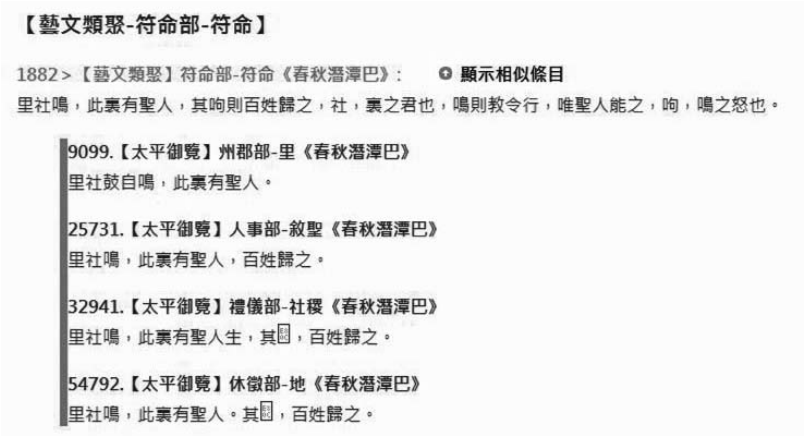


圖二：「符命」在兩部書中的對應統計

系統然後列出「符命」在《藝文類聚》中所有的條目（圖三）。在臚列條目的時候，使用者可以選全部、只顯示有對應到的、只顯示沒有對應到的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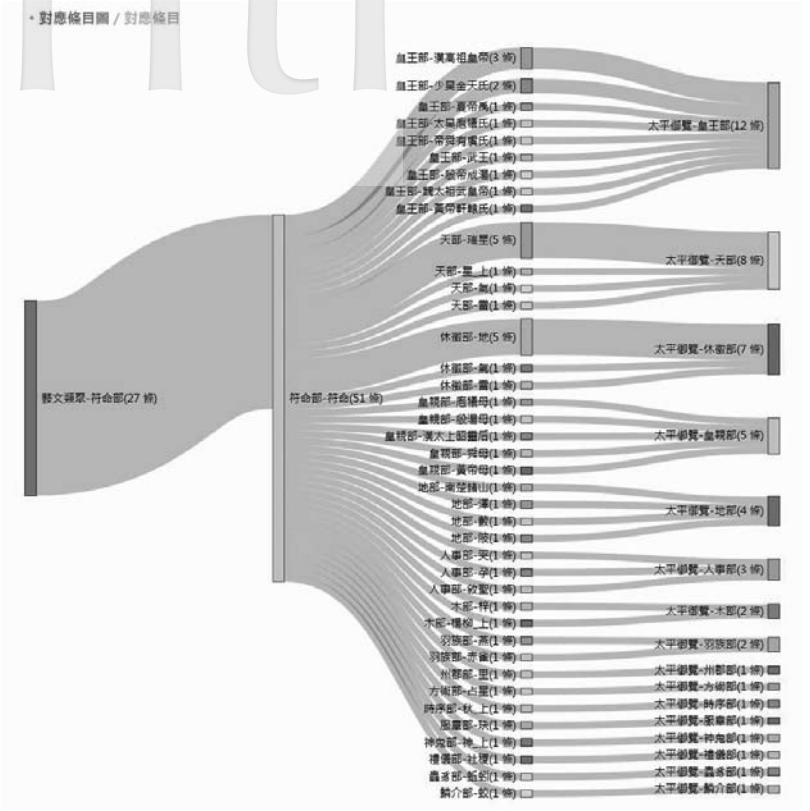
圖三：「符命」在《藝文類聚》中的條目

若條目能於另一部類書中找到對應，則其項目後方會有「顯示相似條目」的點擊字樣，點下後其對應的條目即會顯示於下方，圖四是一例，這個條目在《太平御覽》有四條對應。



圖四：以《藝文類聚》「符命」部條目爲例的單條條目及對應

下一個功能提供一個圖表，顯示想要分析的部／目中的條目，在另一部類書裡的分布。圖五還是用《藝文類聚》中的「符命」做例子。（《藝文類聚》的「符命」部下只有一個目，也是「符命」。所以我們不強調看的是部還是目（或子目）。最左邊的長柱代表《藝文類聚》中「符命」的條目中，有27 條可在《太平御覽》裡找到對應。旁邊長柱中的「51 條」，表示這27 條在《太平御覽》中可以找到51 個條目與之對應。右邊和右中則分別顯示《太平御覽》中這51 個條目，在所屬的部和目中的分布。這個例子十分有趣，因爲從這個圖表立刻可以看出「符命」部在《太平御覽》消失了。這個現象我們會在下一節做進一步的說明。



圖五：《藝文類聚》「符命」中的條目在《太平御覽》中的分布

最後一個功能（圖六）是將上面的圖表用文字的方式做排列。也就是僅列右邊《太平御覽》中在各部的分布，亦可展開。

圖六：表列式呈現《藝文類聚》「符命」中的條目在《太平御覽》各部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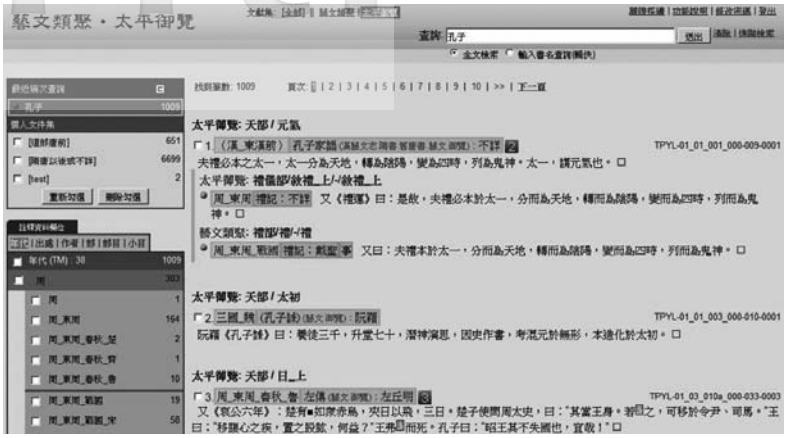
2.「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

以上的「類書對應查詢系統」在兩部類書的知識結構上提供鳥瞰式的比較，但並沒有搜尋的功能。我們的第二個系統是杜協昌博士用「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HDL）的系統架構所建的「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15] 這個資料庫除了可以進行全文檢索外，也充分利用到了上述的資料結構，將檢索結果用出處、年代、作者、部別、類目等學者會有興趣的資訊進行後分類，同時將分類後的情況呈現在系統中。系統更有「輯佚」的功能，可以將一本書在類書中出現的所有條目列出，並分析它們出現的部別和類目。這個功能也讓研究者可以觀察同一本書在不同類書中出現的分布，爲不同時代的知識分子在如何看待和運用一本書的同異上提供訊息。同樣的分析和觀察也可以運用在同一個條目上。總體來說，研究者針對感興趣的內容進行檢索之後，不必再像以往一樣耗費諸多時間，分析出處來源、作者及其時代、屬於哪個部目等，系統會自動幫助研究者分析相關資訊，省卻了許多一一搜尋排比的功夫。

以下我們用兩個例子來說明。首先我們對《太平御覽》這個文本下檢索詞「孔子」（B.C. 551-479）。圖七顯示在《太平御覽》中，「孔子」一詞出現977 次，介面中間區塊呈現「孔子」出現條目的部／目、書名（包含年代和作者）、及條目內容。如果此條目在這兩部類書其他的地方也出現過，則在條目標題後會用一個數目字代表，如果按下這個數字，相對的條目就會展開。在圖七的例子裡，第一條出現在天部元氣目的條目，還在別處出現過兩次：一次在《太平御覽》的禮儀部／敍禮上目，一次在《藝文類聚》的禮部／禮目。比較特別的是第一次出現時，《太平御覽》引用的出處是《孔子家語》，另外兩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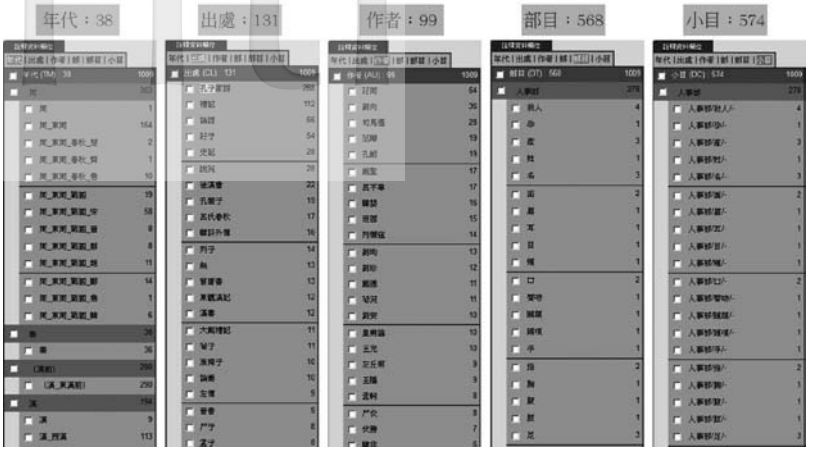
[15] http://thdl.csie.org/L303_YiWen_YuLang/RetrieveDocs.php 。本系統需要登錄。Jieh Hsiang, Szu-Pei Chen, Hsieh-Chang Tu, “On Building a Full-Text Digital Library of Land Deeds of Taiwan”, Digital Humanities 2009 (College Park, Maryland, 22-25 June, 2009).

的出處則爲《禮記・禮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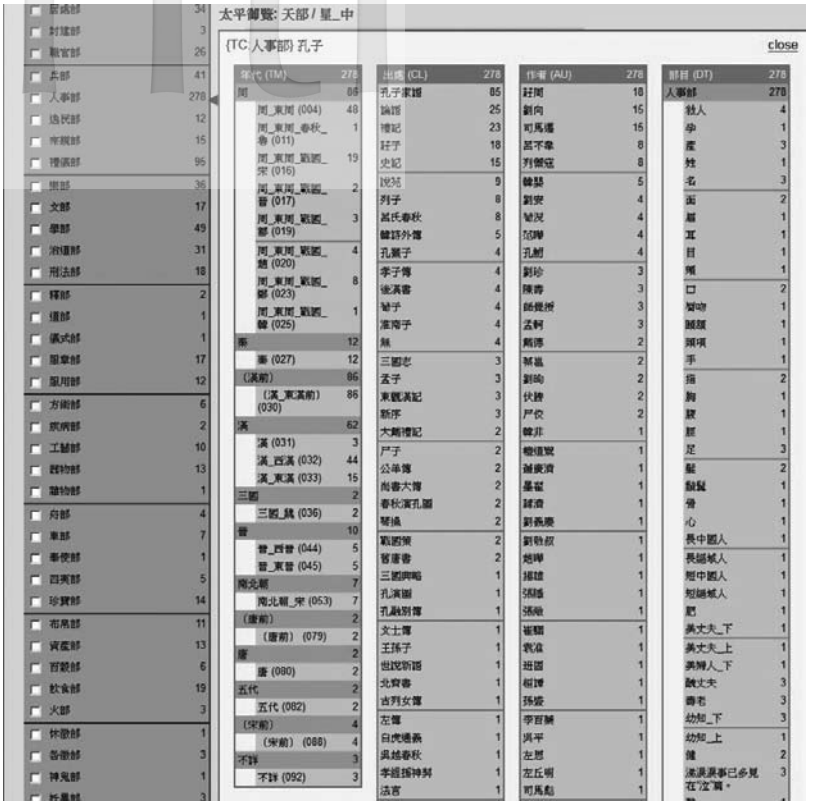
圖七：「孔子」在《太平御覽》檢索的結果

圖七的左上方的區塊爲檢索歷史，左下則爲本系統中重要的後分類功能。簡單的來說，後分類就是把整體的檢索結果用不同的詮釋欄位來排列，這個功能提供使用者一個鳥瞰檢索結果的機制，以便快速的作分析。圖八是「孔子」的檢索結果的分析，可以看出「孔子」的1009 個條目來自131 個出處，由99 個作者所寫（但有40 個出處、486 個條目作者不詳），且在《太平御覽》的55 部中均有出現，如果算目，則有568 目，如連小目一起算，則有574 目中提到「孔子」。



圖八：「孔子」在《太平御覽》檢索結果的後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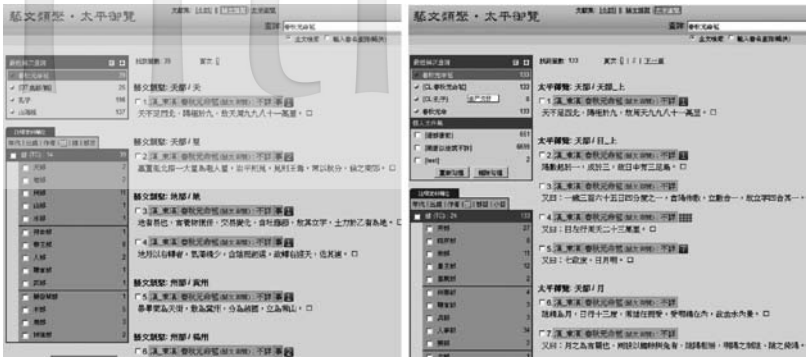
「孔子」在《太平御覽》出現最多的是人事部了，共278 條。將游標放在人事部的數字（278）上可以呈現出更細的後分類（圖九）。



圖九：「孔子」在《太平御覽》檢索結果在人事部的細部後分類

本系統還提供一個「輯佚」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輸入一本書名後，回傳所有引自該書的條目。圖十以「春秋元命苞」爲例，該書在《藝文類聚》中出現39 筆，分佈在14 部，其中州部11 條，帝王部6 條，木部5 條，人部2 條。

到了《太平御覽》，條目數增爲133 次，其中人事部大幅增加到34 條，此外天部27 條，皇王部12 條。地部沒有增加，維持在11 條（雖然內容不盡相同）。



圖十：以「春秋元命苞」爲例的輯佚查詢

我們指出雖然這個系統提供兩部類書分別的全文檢索，我們並不讓使用者同時查詢兩部類書。這是一個刻意的設計，而不是技術上的限制。全文檢索在技術上不是困難的事，但我們強調的是檢索之後的分析，這種統計資料和檢索後分類給予人文學者一個更寬廣的觀察、分析和詮釋的視野，便利人文學者發掘問題，並針對不同問題，迅速進行直觀觀察和分析，亦是推進學界以新方法和新角度，對大型類書進行細緻觀察和比較研究的起點。這種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當然有它的局限性，自動化工具雖然能夠萃取出有用的統計資料，然而不能期待這個平台變成一個「決策系統」，分析及詮釋的腳色還是在研究者身上。

以下我們提出一些透過上述的兩個系統對《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比較分析的初步觀察與分析。

三、兩部類書「部」的比較

「部」是兩部類書最顯而易見、亦最便於分析和比較的知識架構。其實各部之上，還存在著一個天、地、人、事、物的知識序列，

每個大類之下包含一定數量的部。在葛兆光看來，這一安排顯示了當時人知識世界的結構，顯示當時人對廣袤世界的理解和敘述，是從象徵著時間和空間的天地開始的，是當時人知識世界的終極依據；其後爲人的社會生活方式的論述，被排擠的佛道相關知識，以及被視爲細枝末節的自然界各種具體知識。[16] 不過比較起來，兩部類書在這一維度上結構頗爲相似，「天」部分包含的部數最少，其下漸次增加，而「物」的部分包含部數最爲龐大，均超過半數。雖然《太平御覽》中「地」的部分因爲合併，由《藝文類聚》中的5 部減少至2 部，而「物」的部分則因細分和由類升格爲部，而大增了8 部之多，但這一變化並未挑戰原本知識序列的格局，因此並非本文分析的重點。

對於兩部類書「部」的比較分析，學界則積累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當代學者周生杰便細緻比較了兩者，發現《太平御覽》中除了「逸民」、「宗親」、「四夷」等少數新設的部之外，55 個部中的絕大部分都與46 部的《藝文類聚》重疊，或由其一部（或部下面的目）析分而來。[17] 這似乎也印證了宋代刊印的《太平御覽》序言中的說法，即該書的編修參考了南北朝時期的《修文殿御覽》、唐初的《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其它書而成，因此二書在整體結構上亦非常接近。[18]

本部分內容並不是試圖挑戰上述說法，但是透過上述系統的幫助，我們不僅可以觀察相隔350 年間，兩朝高層文人對於知識分類設置上整體的變化，亦可以觀察不同部類的比重、內容上變化的趨向，從而在整體具有延續性的畫面之下，窺見更爲細微和深層的變化。

（一）「部」的結構變化

比較起來，《藝文類聚》各部亦並非被《太平御覽》全盤繼承，

[16]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頁601-603。
[17] 周生杰：《太平御覽研究》，頁401-403。
[18] 李昉等敕撰：《太平御覽》，原序，頁893-3。

「符命」部及相關類別的消失，便是其中一個明顯的變化。所謂「符命」，是君權神授的象徵，表現爲自然界出現特別的現象或物品。它的起源駁雜，在秦漢時期成爲極具影響力的思想。在政權更迭的過程中，它亦往往被有心人士利用，從而爲新帝國及皇權確立正統性護航。[19] 在唐初編修的《藝文類聚》中，「符命」部是頗爲重要的一部，因爲它被置於是「人」這個大的類別之首，位置更在帝王部之前。「符命」部下總共有51 條引文，講述上至上古帝王，下至三國君王出生、人生經歷中的奇異現象。符命在帝王部分之前，意味著後者權力的獲得，必須獲得上蒼的暗示或象徵。[20]

至《太平御覽》編修時，曾經在《藝文類聚》中佔據重要位置的「符命」部，已經消失不見了。其部下一半左右的內文爲後者所收錄，卻散落到「皇王」（12 條）、「天」（8 條）、「休徵」（7 條）、「皇親」（5 條）、「地」（4 條）、「人事」（3 條）等16 個不同的部類中。例如《藝文類聚》中引自東漢讖緯書《河圖》中的商湯（約 B.C. 1675-1646）誕生傳說：「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這一內容到了《太平御覽》中，被分別收錄在「皇王部／殷帝成湯」及「皇親部／殷湯母」兩類之下，它試圖說明的是兩個人物，而非強調湯王出生時的奇異。不過，少量條文與《太平御覽》「休徵」部的內容相似，意味著「符命」部雖然隱退，其觀念卻並未消失無踪。

而《太平御覽》新增的部分，除了少數部一分爲二或合二爲一的情況外，總共新增了11 個部，其中「偏霸」、「宗親」、「四夷」爲完全新增設的部；「學」、「釋」、「道」或多或少可以在之前找到一些影子，但已經內容大變；「逸民」、「奉使」、「疾病」、「竹」、「菜茹」五部則是以前《藝文類聚》部下面的類，現在被升格爲獨立的一部。即使《太平御覽》中完全新設的部，在之前的史書或類書中亦非完全無

[19] 陳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 年），頁 1-98。

[20]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頁601-603。

跡可尋。如「偏霸」往往指割據一方的政權，如三國時期蜀國的劉備（161-223）、劉禪（207-271），吳國的孫權（182-252），以及南北朝時期南朝的帝王等。《藝文類聚》並無此類別，部分帝王乃是被收入「帝王」部中。周生杰便指出，這反映出二書在統治正統觀念上的差異，《太平御覽》的編修者，將南北朝史書本來並未彰顯的正統偏霸觀念加諸其中，將位於中原者列爲正統，而雄踞江南者則歸入偏霸，這實際上是爲了北宋鞏固政權的政治目的服務的。[21]

而《太平御覽》新增的「宗親」部，同樣爲《藝文類聚》所無。不過在唐代編修的另外幾部著名類書，如《三教珠英》、《白氏六帖》等當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類別。[22] 該部下按照祖父母、父母、繼母、叔伯等親屬稱謂區分，共分成27目，總計660條，其中77條可以在《藝文類聚》中找到相似條目，除了來自「人」部的38條爲大宗外，其它都零星散布在「職官」、「禮」、「封爵」等22個部之下，亦顯示其來源的紛雜。

至於新設的「四夷」部，其稱由來已久，泛指中國王朝統治之外的各類人群或政體，歷朝史書多有記載相關內容。[23] 該部下則分爲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大類，總共敘述了388個不同的政權、部落或群體，總計920個條目，如日本、朝鮮、大秦（今羅馬或敘利亞）、吐蕃、林邑（今越南中部古國）等。隋朝及唐初編修的類書《北堂書鈔》及《初學記》中，亦出現四夷的類別，但均與音樂聯繫在一起，亦非強調不同的政權和群體。[24]

更相近的來源，可見於中唐時期杜佑（735-812）編修的著名政書《通典》，該書記載了歷代典章制度沿革，其中最後一部分「邊防」，便分爲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四大類別，每個類別下按照政

[21] 周生杰：《太平御覽研究》，頁363-364。
[22]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頁87-108。
[23] 周生杰：《太平御覽研究》，頁191。
[24] 唐光榮：《唐代類書與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08年），頁114。

權及群體名一一編寫，與《太平御覽》如出一轍。[25] 其中《太平御覽》「四夷」部西戎部分總計有344 條，更有約有近十分之一的條目來自於《通典》，顯示西戎部分的編者曾直接參考了該書。就記載的政權或群體數量而言，《太平御覽》總共記載的數量已經擴充至《通典》的兩倍。具體而言，「東夷」部分敘述了22 個群體，與《通典》（20 個）相較變化不大；「北狄」部分（8 個）則較《通典》的42 個大大減少；而「南蠻」和「西戎」部分則增幅顯著，分別爲181 個及160 個，分別是《通典》同類別的3.2 倍與2.1 倍。顯示出《太平御覽》在編修時，至少在南蠻和西戎部分參考文獻範圍已大爲增加，較之《通典》走得更遠了。

（二）各部內容的變化

除了上述部類設置明顯的變化之外，《太平御覽》的部名大部分與《藝文類聚》相同或相近。周生杰便按照部類名稱和引文內容，製作了《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部類繼承關係的對照表。[26]

這樣一種對照表，對於我們理解二書關係、分析各部比重和內容變化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但是少部分相似部類下包含的內容，卻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以至於無法斷定二者必然存在繼承關係。本文作者之一便借助「類書對應查詢系統」，根據相似條目分佈的情況，重新判讀了二書相似部類的情況，如下表所示。[27]

---

[25]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重印本），頁4978-5512。

[26] 周生杰：《太平御覽研究》，頁401-402。

[27] 鍾嘉軒：《類書知識分類變化之自動分析與討論：以『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爲例》，頁65-69。

表二：兩部類書相似條目對應情況

	《類聚》	周生杰於研究中認定之相似部類	系統判定之相似部類	其他顯著對應之部類
1	天部（516 條）	天	天（362 對）	人事（30 對） 休徵（20 對）
2	歲時部（516 條）	時序	時序（307 對）	人事（28 對） 天部（22 對）
3	地部（146 條）	地	地（88 對）	天（8 對） 兵（7 對）
4	州部（68 條）	州郡	州郡（22 對） 地（16 對）	珍寶（5 對） 布帛（4 對）
5	郡部（25 條）	州郡	職官（7 對） 州郡（4 對）	人事（2 對） 工藝（1 對）
6	山部（236 條）	地部	地部（79 對）	人事（5 對） 州郡（4 對）
7	水部（374 條）	地部	地部（194 對）	人事（13 對） 居處（12 對）
8	符命部（51 條）	休徵 咎徵（0 對）	皇王（12 對）、天（8 對）、休徵（7 對）、皇親（5 對）、地（4 對）、人事（3 對）、木（2 對）、羽族（2 對）……其他皆只有 1 組對應	
9	帝王部（322 條）	皇王 偏霸（4 對）	皇王（176 對）	人事（20 對） 天（10 對）
10	后妃部（75 條）	皇親	皇親（36 對）	木部（2 對） 居處（2 對）
11	儲宮部（89 條）	皇親	皇親（43 對）	人事（12 對） 皇王（4 對）
12	人部（2600 條）	人事	人事（1179 對）	兵（43 對） 宗親（38 對）
13	禮部（572 條）	禮儀	禮儀（273 對）	人事（24 對） 居處（19 對）

14	樂部（571 條）	樂	樂（143 對）	人事（27 對） 兵（7 對）
15	職官部（816 條）	職官	職官（466 對）	人事（58 對） 皇親（25 對）
16	封爵部（161 條）	封建	封建（81 對）	人事（13 對） 州郡（5 對）
17	治政部（158 條）	治道 奉使	治道（38 對）、人事（20 對）、刑法（16 對）	奉使（9 對） 職官（5 對）
18	刑法部（69 條）	刑法	刑法（33 對）	職官（2 對） 治道（2 對）
19	雜文部（435 條）	文	文（85 對） 學（54 對）	人事（23 對） 職官（11 對）
20	武部（143 條）	兵	兵（55 對）	人事（12 對） 職官（3 對）
21	軍器部（184 條）	兵	兵（194 對）	人事（26 對） 工藝（11 對）
22	居處部（445 條）	居處	居處（269 對）	人事（26 對） 珍寶（18 對）
23	產業部（178 條）	資產、器物（2 對）、雜物（0 對）	資產（92 對）	人事（31 對） 居處（14 對）
24	衣冠部（81 條）	服章	服章（42 對）	人事（6 對） 兵（5 對）
25	儀飾部（52 條）	器物（0 對） 雜用（查無此部，以內容判斷應是服用部：1 對）	儀式（13 對）、兵（9 對）、天（6 對）、人事（6 對）、樂（4 對）、職官（3 對）、地（2 對）、疾病（1 對）、服用（1 對）、帝王（1 對）	
26	服飾部（275 條）	服用	服用（151 對）	人事（40 對） 職官（12 對）

27	舟車部（120 條）	舟 車	舟（69 對）、車（35 對）、人事（18 對）	地（6 對） 兵（6 對）
28	食物部（111 條）	飲食	飲食（63 對）	人事（29 對） 資產（5 對）
29	雜器物部（110 條）	器物	器物（66 對）	人事（15 對） 珍寶（7 對）
30	巧藝部（115 條）	工藝	工藝（47 對）	兵（7 對） 人事（5 對）
31	方術部（52 條）	方術 疾病	方術（16 對）、人事（8 對）、疾病（7 對）	文（2 對） 職官（1 對）
32	內典部（169 條）	釋（0 對）	四夷（12 對）	工藝（1 對）
33	靈異部（207 條）	妖異 道 神鬼	人事（18 對）、妖異（12 對）、神鬼（11 對）、道（8 對）、天（8 對）、居處（6 對）、禮儀（6 對）、地（6 對）、鱗介（4 對）、珍寶（4 對）、藥（4 對）、皇王（4 對）、職官（3 對）、服章（3 對）……其他部類皆爲2 組對應以下	
34	火部（195 條）	火	火（77 對）	人事（21 對） 兵（15 對）
35	藥香草部（556 條）	百卉 藥 菜茹 香	百卉（173 對）	藥（85 對）、菜茹（50 對）、香（42 對）、地（25 對）、人事（17 對）、木（16 對）
36	寶玉部（289 條）	珍寶	珍寶（253 對）	人事（41 對） 地（14 對）
37	百穀部（144 條）	百穀	百穀（112 對）	人事（16 對） 時序（7 對）

38	布帛部（94 條）	布帛	布帛（73 對）	藥（12 對） 服用（9 對）
39	果部（517 條）	果	果（381 對）	菜茹（33 對） 木（28 對） 人事（20 對）
40	木部（746 條）	木	木（423 對）	果（73 對） 人事（42 對）
41	鳥部（628 條）	羽族	羽族（420 對）	人事（42 對） 獸（23 對）
42	獸部（535 條）	獸	獸（373 對）	人事（66 對） 資產（24 對） 兵（22 對）
43	鱗介部（180 條）	鱗介	鱗介（121 對）	人事（22 對） 地（16 對）
44	蟲豸部（173 條）	蟲豸	蟲豸（81 對）	人事（9 對） 時序（3 對）
45	祥瑞部（366 條）	休徵	羽族（130 對）	休徵（49 對） 獸（46 對） 天（29 對）
46	災異部（107 條）	咎徵	咎徵（15 對） 時序（14 對）	天（4 對） 地（4 對）

其中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藝文類聚》中的「符命」、「儀飾」、「內典」、「祥瑞」四部後來的演變上。「符命」部上文已經提及，「儀飾」部（表中第25 筆）則是講述節、黃鉞等與禮儀制度有關的器物文獻，總計收錄52 條內文。其內容在《太平御覽》中並非進入器物、雜用部，而是儀式、兵、天、人事等諸部。而「祥瑞」部（表中第45 筆）總計收錄了210 條引文，講述的是各種代表吉祥的自然界現象，如樹木結爲連理、麒麟或鳳凰出現等，它們的出現往往象徵著皇治昌明及天下太平。而到了《太平御覽》中，「祥瑞」部超過六成（130 條）的內容，都可以在收錄各種鳥類的「羽族」部中找到。

airiti

如戰國時期思想家荀況（B.C. 313-238）的一段話：「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鳳在列樹。」這句話最後一句「鳳在列樹」，亦被改動爲「麟在郊野」及「鳥鵲之巢可俯而窺」，收入同書「祥瑞部／麟」及「鳥部／鵲」之下。而在《太平御覽》中，有關麟的一段不見了，有關鳥的兩段則均收入「羽族」部之下，一條放在鳳類，一條放在鵲類。而在《太平御覽》中含義與之接近的「休徵」部（休徵爲古語，其含義亦是吉祥的徵兆）中，與《藝文類聚》「祥瑞」部共引的則只有約四分之一的內文（49 條）。

至於《太平御覽》中的「釋」、「道」二部，名稱上似乎和《藝文類聚》中的「內典」部及「靈異」部存在關聯，但檢視內容之後，便會發現其關聯頗爲微弱。所謂「內典」，乃是一種佛教中心的詞彙，意指佛教之內的經文典籍等，而佛教之外的書籍，則歸之爲「外典」。早在南北朝時期，梁國的虞孝敬（南朝人，生卒年不詳）便著有《內典博要》，按照類書的體制編排佛教典籍。初建的唐王朝繼承了南北朝以來崇佛的氣氛，因此在名稱上亦沿用之。道的部分則尚無專門類別，而需要到「靈異」部下面的仙道目中去搜尋。在兩部類書之間，已經出現了這一類別的劃分，據說在《藝文類聚》編修後不久，武則天時期又有編輯一部類書《三教珠英》，「於舊書外，更加佛、道二教及親屬、姓名、方域等部。」[28] 不過這部類書現在已佚，無法一窺其詳。在中唐時期編修的官修類書《初學記》中，亦設有「道釋」部，按照先道後佛的順序，引用其經籍敘述其來歷。[29]

從表格中亦可看出，與《藝文類聚》描述佛教的「內典」部存在最多相似部類的，並不是《太平御覽》的「釋」部，而是「四夷」部。事實上，「四夷」部中僅有37 條（佔4%）可以在前者中找到共

[28] 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七），卷36，頁657。

[29] 不過由於體制的關係，其正文偏重於個別詞彙，下面採用小註引用其它書籍內文。徐堅：《初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90 冊），頁363-372。

引條目，且分散於20個不同的部當中，不過最大宗的來源便是「內典」部（12條）。因爲佛教的交流，亦同時帶來了關於域外政權或群體的信息，由此便成爲此增設部類的知識來源。而該書「靈異」部與《太平御覽》「道」部共引的條目，更僅僅有8條（不到0.6%），顯示其內涵有極大變化。

至於其它各部，研究者未注意《藝文類聚》中內容的一個最大宗的流向，便是《太平御覽》中的「人事」部。它是《太平御覽》中內文最龐大的一部，達9339條，占了整部類書內容的14.2% 。儘管《藝文類聚》中的「人」部亦是最大的一部，涵蓋了2600條內文，但《太平御覽》整整擴充了6739條，這是其它任何部類都難望其項背的。它在部之下目的劃分上，也比《藝文類聚》同部多出了218個目，僅次於「皇親」與「職官」二部。至於其內容，涵蓋了人的生理、心理、情感、行動、特徵等諸方面，亦成爲唯一一個可以在《藝文類聚》的37個部中均找到相似條目的部類，可見其地位之重，以及收錄範圍之廣。

（三）各部比重的變化

整部類書而言，《藝文類聚》總計有14572條引文，《太平御覽》條目數則擴充至65633條，後者的條目數較前者擴充了4.5倍。若按照天、地、人、事、物的總體框架進行比較，會發現條目數增加最多的，乃是「地」、「事」兩大類別，分別增加了6.1倍與5.7倍，高於整體的平均數。

表三：兩部類書各部條目數比重情況（前10部）

	《藝》	條目數	佔《藝》比重	《太》	條目數	佔《太》比重
1	人	2600	17.8%	人事	9339	14.2%
2	職官	816	5.6%	兵	4649	7.1%
3	木	746	5.1%	職官	4058	6.2%
4	鳥	628	4.3%	地	3296	5.0%
5	禮	572	3.9%	禮儀	2298	3.5%
6	樂	571	3.9%	居處	2265	3.5%
7	藥香草	556	3.8%	天	1882	2.9%
8	獸	535	3.7%	州郡	1845	2.8%
9	果	517	3.5%	獸	1739	2.6%
10	天（或時序）	516	3.5%	羽族	1669	2.5%
總計		8057	55.3%		33040	50.3%

對於同一部類書中不同部之間比重不均的問題，之前研究者也早有注意到。如郭伯恭便根據《太平御覽》各部包含的卷數，指出「人事」、「兵」、「職官」、「皇王」、「禮儀」及「地」六部，規模均在40卷以上，加起來幾乎占了全書總共千卷的近二分之一。而不滿10卷者總計有20部，反而未及全書的十分之一。[30] 這是一種各部比重的蠡測方法，不過在今日，我們亦可以有諸多其它重新估算的方法。姑且以各部所含的條目數量而計，排在前六位的便與按卷數者略有不同，即「人事」、「兵」、「職官」、「地」、「禮儀」及「居處」六部，換句話說，卷數雖多的「皇王」部，條目數卻不及「居處」部。總體而言，這六個部的條目數佔了全書的近四成，而每個部包含的條目數都超過了2000條，最多的「人事」部更達9339條。若在加上排在其後的「天」、「州郡」、「獸」、「羽族」四部，即相當於全書總條目數的二分之一。

[30] 郭伯恭：《宋四大書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頁22。

若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部類書進行比較的話，會發現就各部條目數而言，二者排在前十名的部，有「人事」(「人」)、「職官」、「禮儀」(「禮」)、「天」、「獸」五部雷同。不同的是，《藝文類聚》中還有「鳥」、「樂」、「藥香草」、「果」、「木」幾個部，這些部在《太平御覽》中的比重均大大下降。《太平御覽》中的「兵」、「州郡」、「地」三部，則因分別合併了《藝文類聚》中的兩個至三個部類數量擴充，而躍升至前十名之列，「居處」和「羽族」兩部亦後來居上。而兩部類書條目數排在後十名的，則沒有一部雷同。《藝文類聚》分別爲「布帛」、「儲宮」、「衣冠」、「后妃」、「刑法」、「州」、「儀飾」、「方術」、「符命」及「郡」部，每個部的條目數均沒有超過百條，最少的「郡」部更只有25 條。而到了《太平御覽》中，除了「符命」部取消外，其它各部則均因合併、擴充、改造等因素而上升。在該書中屈居後十名者，包括了由《藝文類聚》中一部拆分而來的「舟」部，和由部下面的一目演化而來的「逸民」、「香」、「妖異」、「神鬼」、「竹」、「奉使」6 個部，新設的「釋」、「偏霸」部，以及「雜物」部。由類升部，或多或少反映了這些類別在當時士人心目中重要性的上升，而與其條目數多寡無關，如講述奉命出使事宜的「奉使」部，便僅有69 條，卻獨立爲一部。

至於《太平御覽》條目數擴充最多的部，除了上文提到的「人事」部外，依次是「兵」部，包含4649 個條目（比《藝文類聚》中的相似部類增加4322 條），「職官」部（增加3242 條）、「地」部（增加2540 條）、「居處」部（增加1820 條）、「州郡」部（增加1752 條）、「天」部（增加1366 條）等。[31] 其中，「兵」部的條目數在《太平御覽》各部中排名第二，而在《藝文類聚》中，與之相似的「軍

[31] 本統計數字中《太平御覽》的「兵」部，爲《藝文類聚》中的「武」、「軍器」二部合併之後進行比較；「地」部，乃是與《藝文類聚》中的地、山、水三部合併之後進行比較；「州郡」部則是與《藝文類聚》中的州、郡二部合併比較。

器」與「武」部分別排在第22和31位。其引用的文獻來源有360種，而《藝文類聚》的「軍器」與「武」部分別是29種和81種。「職官」部的條目數在《太平御覽》中排名第三，在《藝文類聚》中更排名第二，顯示該部的文獻累積一直頗爲豐富，亦受到當時官僚文人的推重。至於其文獻來源的書籍，可以發現《史記》、《漢書》、《三國志》、《後漢書》、《晉書》等史書，均是二書最爲倚重的文獻，而《舊唐書》及五代時期的史書，則是《太平御覽》新增的重要材料來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個部類中均引用了不少來自於唐代杜佑編修的《通典》，「兵」部有118條，「職官」部有30條，佔了整部書對於《通典》引用量的近四分之三。

就條目來源所屬的時代而言，《太平御覽》中兩部雖然都增加了唐、五代的史料，但增加更多的是前代的資料，在「兵」部中最多的是來自周朝文獻的條目（1007條），其中來自《左傳》者便超過三分之一；其次爲漢、晉、南北朝時期。「職官」部條目數最多的集中在晉朝（1112條），其後爲漢、南北朝時期。若僅就來自唐代以降新增書籍的條目而言，「職官」部增幅近四分之一，高於「兵」部。尤其來自《舊唐書》的條目數達415條，是該部總計289個文獻來源中收錄數最多的一個。

而從「釋」、「道」兩部在二書中分類和比重的變化上，我們更可以窺見在當時高層文人心目中該類別地位的變化。在《太平御覽》的55個部中，「道」部的條目數排在第14位，而「釋」部則排在第50位（倒數第6），顯示出二者地位至少在該類書中極大的不平衡，這與《藝文類聚》中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條目數和內容而言，《藝文類聚》「內典」部在該書46部中排名第26，位居中游。此部其實對於佛教事蹟的敘述非常簡略，絕大部分條目是著錄和佛教有關的詩文、寺碑等，大半均來自篤信佛教的南北朝時期，一方面反映的是南北朝時期鼎盛的文學傳統的延續，另一方面亦有史料彙編的性質。到了《太平御覽》中，「釋」部則是專門針對佛教情況專設的部，下

分爲敘佛、奉佛、僧、異僧、經、象、戒律、禪、塔、寺等10目，總計197條引文。其中只有一條來自《藝文類聚》，還是從「禮」部，而非「內典」部借來的。另外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引自唐代以後編修書籍的內容極爲豐富，超過三成，在總計55部中排名第二。

而與佛教相比，道教的宗教化成果更是達到令人驚異的程度。《藝文類聚》中，它並沒有獨立的一部，而內容頗爲龐雜的「靈異」部，下設仙道、神、夢、魂魄四目，其中前兩部分提到的或傳說、或眞實人物事蹟，在2-6世紀道教逐漸宗教化的過程中，亦被收入道教的眾神譜系當中。[32] 不過，道教似乎還未被當作一個系統化的宗教對待。到了《太平御覽》中，不但新設獨立的「道」部，其下更分設道、眞人、道士、齋戒、養生、仙經等總計53個目，爲佛教的5倍多；引文數量更達1402條，爲佛教的7倍之多。引文內容則涉及到道教的教義、組織、人員及經典，更談起其日常服裝、禮儀用品、建築樣式及師承等，展示的是一個組織嚴密、無遠弗屆、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道教形象。按照湯一介的研究，在東晉南北朝時期，道教形成爲完整意義上的宗教團體，包括它具備了一整套理論體系，形成有影響力的教會組織，具有較固定的教規教儀，還有闡發其教義的經典，及固定崇奉的神靈和教派的傳授史等。[33] 但是在唐初編修的《藝文類聚》中，這一發展趨勢顯然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直到宋初的《太平御覽》，我們才看到了這一發展的恢弘成果。

雖然《太平御覽》的條目安排上出現了有關道教的條目遠勝佛教的現象，但若將比較的視野擴大，會發現佛教在知識架構中的勢力仍然佔據極爲重要的分量。在編修《太平御覽》同一時期，同樣由李昉主導編成的另外兩部大型類書《太平廣記》和《文苑英華》，便俯拾皆是大量與佛道教有關的資料。二書的編修目的是爲了彌補《太平御

[32]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頁484-505。
[33] 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88年），頁11-13。

覽》對於文學作品收錄的不足，因此其中文學作品佔了很大比重。傅大爲（Fu Daiwie）的研究亦指出，《太平御覽》與《太平廣記》來源於唐五代以來不同的筆記傳統，前者以帝國爲中心，在知識界佔據優勢，與文人及官員生活更契合；而《太平廣記》則缺乏政治中心，與民間宗教及普通人信仰世界相結合。[34]

四、兩部類書「目」、「小目」和條目的比較

除了整體的部之外，我們還可以借助系統，對於類書進行更爲精細的目、小目，乃至條目的比較分析。透過這一分析，亦可以進一步釐清二書內文之間的關係。對於這一問題，歷代學者亦有不同的觀點。南宋時期學者便有人認爲《太平御覽》曾大量參考原典；有人則認爲其不過是「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35] 後一說法逐漸佔上風，當代學者周生杰雖未完全否認前一可能性，亦舉出《太平御覽》直接摘抄《藝文類聚》、從而和原書不符的例子，說明二者的確存在轉抄關係。[36] 但是，人工舉例式的比較，畢竟無法取代全局鳥瞰式的對比觀察；資料庫的運用使得這一觀察成爲可能。

（一）兩部類書「目」、「小目」的比較

「目」設置的多寡，固然與當事人資料蒐集多寡、編者興趣的有無、類書本身的目的所在等主觀因素有關，它亦反映了當時人對於某一部類知識認識的程度。從兩部類書整體「目」的比較上，可以明顯

---

[34] Fu Daiwie: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960-1269).” in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105-107.

[35] 洪邁：《容齋隨筆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6 年）（五）卷 7，頁 59；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四）（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卷 14，頁 404。

[36] 周生杰：《太平御覽研究》，頁 401-411。

看出數量的急劇增加。在《藝文類聚》46 個部之下，總共設置了 734 目，《太平御覽》則已經擴充了 5.6 倍，達 4078 個。

表四：兩部類書「目」、「小目」與條目數比較

	《藝》部名	目數	條目數		《太》部名	目數	小目數	條目數
1	天	13	516	1	天	44	0	1882
2	歲時	21	516	2	時序	45	0	1629
3	地	8	146					
4	山	24	236	3	地	157	525	3296
5	水	23	374					
6	州	13	68					
7	郡	5	25	4	州郡	27	331	1845
8	符命	1	51					
9	帝王	50	322	5	皇王	224	0	1065
				6	偏霸	107	0	153
10	後妃	1	75	7				
11	儲宮	3	89		皇親	263	0	914
				8	人事	278	0	9339
12	人	60	2600	9	逸民	10	0	270
				10	宗親	27	0	660
13	禮	20	572	11	禮儀	93	0	2298
14	樂	13	571	12	樂	42	16	1109
15	職官	43	816	13	職官	290	121	4058
16	封爵	7	161	14	封建	29	0	364
				15	治道	16	0	637
17	治政	6	158	16	奉使	3		69
				17	四夷	22	371	920
18	刑法	1	69	18	刑法	48	0	889

				19	文	67	0	1005
19	雜文	15	435	20	學	27	0	713
20	武	2	143	21	兵	201	0	4649
21	軍器	10	184					
22	居處	20	445	22	居處	98	0	2265
23	產業	11	178	23	資產	96	0	1495
24	衣冠	9	81	24	服章	79	0	1397
25	儀飾	5	52	25	儀式	20	0	321
26	服飾	23	275	26	服用	81	0	1468
				27	舟	29	0	286
27	舟車	2	120	28	車	51	0	489
28	食物	9	111	29	飲食	67	0	1402
29	雜器物	9	110	30	器物	106	0	1037
				31	雜物	23	0	164
30	巧藝	12	115	32	工藝	32	8	722
				33	方術	33	0	731
31	方術	5	52	34	疾病	58	0	536
32	內典	2	169	35	釋	11	0	197
				36	妖異	6	0	212
33	靈異	4	207	37	道	58	0	1402
				38	神鬼	4	0	171
34	火	8	195	39	火	9	0	334
				40	藥	151	55	894
				41	香	42	0	254
				42	百卉	107	0	673
35	藥香草	46	556	43	菜茹	37	0	400
36	寶玉	13	289	44	珍寶	48	0	1212
37	百穀	9	144	45	百穀	15	0	545
38	布帛	6	94	46	布帛	34	0	800
39	果	37	517	47	果	76	0	1058

				48	木	129	0	887
40	木	42	746	49	竹	2	37	161
41	鳥	40	628	50	羽族	100	19	1669
42	獸	24	535	51	獸	65	66	1739
43	鱗介	12	180	52	鱗介	210	0	1149
44	蟲豸	15	173	53	蟲豸	82	0	706
45	祥瑞	25	366	54	休徵	16	32	367
46	災異	7	107	55	咎徵	83	0	726
	總計	734	14572		總計	4078	1581	65633

就兩部類書中各部中目數多寡的排列而言，在《藝文類聚》中，目數最多的就是「人」部（60 目），其次爲「帝王」、「藥香草」「職官」、「木」等。而在《太平御覽》中，目數最多的是「職官」部（290 目），其次爲「人事」、「皇親」、「皇王」、「鱗介」、「兵」等。若較之《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絕大部分部的目數均大大擴充了，其中「皇親」部位居第一，其目數足足比《藝文類聚》「后妃」、「儲宮」兩部合計還多了 259 目；其次爲「職官」部，比《藝文類聚》增多 247 目；「人事」、「鱗介」、「兵」、「皇王」、「藥」等部又依序次之。

據我們觀察，《太平御覽》各部中目的數量增加情況有幾種類型，其一是增加羅列型，即把屬於該部的人物、事物一一羅列出來，例如「帝王」部，便增加了諸多歷代帝王之名；「職官」部，便更細緻補充歷代官職名稱。其二則是將原有的部、目再做細緻分目，如《藝文類聚》的「鱗介」部，包含了龍、蛟、蛇等 12 目，魚亦是其中一目；到了《太平御覽》中，除了綜述性的「魚」目外，更增加了 146 種以各類不同魚的名稱爲名的目，如鯉魚、鱷魚、鮪魚、魴魚等。

若說以上兩種方式，還是歸納式的增加，那麼第三種方式，增加與主題相關的諸範疇，則具有了拓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意味。例如《藝文類聚》中的「人」部總計 60 目中，其內容涉及到人的生理特

徵（包括頭、目、耳、口、舌、髮等），然後有體貌特徵（美婦人、老等）、人的行爲（言語、吟等）、品格（聖、賢等）、社會行爲（交友、絕交等）、情緒（怨、愁等）、身分等的分別。《太平御覽》「人事」部的整體架構與之相類，不過卻將「隱逸」上下兩目另外獨立爲「逸民」部，將其原本置於「靈異」部下面「夢」目的相關內容納入，同時在人的生理特徵之上，增加了與人的出世與識別有關的目，即「孕」、「產」、「姓」、「名」、「字」等。其它各部分的內容，亦無不大幅度豐富和擴充了，例如描述人生理特徵的部分，《藝文類聚》中有「頭」、「目」、「耳」、「口」等8目，至《太平御覽》中，當時人所認知的全身上下以及內外各器官，均被一一臚列，達76目之多，顯示無論是生理性還是社會性的人，都得到了更深入的討論。再如「兵」部，則將《藝文類聚》「武」部中僅有兩目的「將帥」、「戰伐」，細緻化爲包括115目在內的、有關戰爭主體、戰爭各階段戰略及準備方式的全書，它亦敘述了70餘種兵器和軍中物品，較《藝文類聚》擴充了七倍多。

至於小目，見於《太平御覽》的目之下。根據統計，該書總計在「地」、「四夷」、「州郡」、「職官」等11部下的部分目中，設置了1581個小目。這些小目有兩種情況，一種實際上是對該目事物的再劃分，例如「地」部之下的「河南宋鄭齊魯諸山」目下，有砥柱山、邙山、熊耳山等51個小目；「州郡」部下的九個道，每個道下面再列出所管轄的各州。另一種則是將較紛繁複雜或無法歸類的諸項，歸入一些統合性的範疇，例如「職官」部下，有「雜號將軍」、「雜中郎將」、「諸校尉」等目；「獸」部下有「雜獸」；「樂」部下有「雜樂」；「羽族」下有「異鳥」等，反映了當時知識階層在全力對知識細緻分類的同時，總有一些範疇是旁逸斜出、需要另設範疇規範的。

（二）兩部類書「條目」的比較

在分析系統的幫助之下，我們亦對《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引文條目進行了整體的比較，結果發現，《太平御覽》條目中有7955條與《藝文類聚》共引，佔全書的12.1%。換句話說，《藝文類聚》約有一半的內容，與《太平御覽》中的條目有相似之處。考慮到前者條目中還包含大量的詩文，可以推測後者對於前者記事部分的利用就更加充分了。

上述統計結果，似乎是因應了《太平御覽》直接轉抄前代類書的觀點。但是，假設《太平御覽》果眞完全照抄《藝文類聚》，則兩條目的內文應當一致（或者子句一致）。然而具體檢視二書共引的條目，會發現內容完全一致的條目數只有1393條，只佔全部共引條目的12.6%；而其餘共引條目，則或多或少存在個別字詞上略有差異，或者句子長短、詳略程度不一的情況。[37] 其原因可能有幾個：一是在唐代雕版印刷術出現之前，所謂「書籍」的歷史並不穩定，在輾轉重印傳抄過程中，可能便產生不少變動；二是類書本身的性質決定的，類書並不要求嚴格照抄原文，濃縮摘抄亦可以接受，加之爲眾人輯錄而成，不同部類之下的不同編者，便將原書輯錄出了不同的面貌。此外，還有幾十條文句完全一致，其標注來源書籍卻不相同的例子，這很有可能是不同作者抄錄自不同書籍的關係。

進一步檢視這些完全相同的條目，來源於上百個不同的書籍及少量文章。一致率最高的書籍中，以《詩經》達196條居冠，其次爲《論語》、《禮記》、《周易》、《尚書》、《左傳》、《淮南子》、《楚辭》等書爲多，顯然以儒家經典爲主。不過不要忘記，同書中可能有更多不同的引文存在，因爲這些經典被引用的次數，遠遠超過共引條目數，如《詩經》在《藝文類聚》中總計有350條，而《太平御覽》更多達

[37] 鍾嘉軒：《類書知識分類變化之自動分析與討論：以『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爲例》，頁30-34。

1352 條，顯示大部分還是不同的條目。

此外，就條目的編排結構而言，假若《太平御覽》是有系統地參考前代《修文殿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而來，其某一部目下的條目分佈，或許亦可能呈現出來其書的條目呈現有規律的分布規則（例如集中在中段等特定區間）。如王三慶便透過敦煌文書殘卷中據說來自《修文殿御覽》的數十條文，與《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的分布結構進行對比，認爲《太平御覽》在分別參考和抄錄前代類書時，可能採用的是分別先抄錄後增補的兩節式編排。[38] 但是在資訊工具的幫助下，我們發現其間似乎並無明顯規律可循，這一假設便亦無法得到有效的支持。

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測，則是《太平御覽》雖曰參考《藝文類聚》，但可能只是部類結構上的參考，在具體內容摘抄上，實際上是根據當時所蒐集到的書籍原本，重新輯錄編排而成的，而並非從《藝文類聚》中翻抄回來的。這也就是在兩部類書當中，儘管共引條目不少，但眞正雷同者比例並不高的原因。

五、「新」知識及其來源：引用書籍的比較

上述的論述主要圍繞著兩部類書結構和條文的統計和分析，除此之外，對於各部類引用書籍文獻的情況進行更爲細緻的分析，亦是我們觀察兩個時代知識架構演變的一個途徑。因爲要考察《太平御覽》新增的知識及其來源，一個簡單的比較方法，便是看其引用的書籍當中，有多少是《藝文類聚》纂修之後編修的，而舊的文獻資源又如何被納入新的知識框架。在這方面，資料庫的詮釋資料與自動化比對工具，同樣可以發揮輔助作用。

[38] 王三慶：《敦煌類書研究》（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頁 16-20。

（一）引用書籍文獻數量的比較

《藝文類聚》編修的時代，我們現在觀念中的書尚未穩定，因此可能以篇、章、卷等不同形式存在，爲了簡化起見，我們姑且把經過輯錄的文獻稱之爲「書」。就時間而論，其引用範圍上至周朝，下至初唐，原書未附書目。至於《太平御覽》，書籍的形式已經較爲常見，而其引用範圍則擴展是五代至宋初，宋代的刻本附有書目，據統計總共有1689種書籍。

有關兩部類書的引用書籍文獻的數量，已有不少前輩學者做過統計，不過從目前結果來看，尚沒有統一的答案。就《藝文類聚》而言，早在1920年代，馬念祖（生卒年不詳）曾在「寧失之複，不失之缺」的原則下，統計出《藝文類聚》總共引用了1431種書；[39]1970年代中津濱涉亦按同樣的原則，按日文五十音編出了該書的引書索引，文中並未給出引書總數的統計，根據我們的計算，該書列出書目有1025種，詩文推算則超過4600種。[40]而韓建立則統計出《藝文類聚》「事」的部分總共引用了850種左右書籍，有640位作者，然後按每位作者均有別集計，推測出總計引用1490種書。[41]

至於《太平御覽》，雖然書中附有書目，但錯誤甚多，而且學者們普遍相信數字不止於此，1920年代馬念祖統計出《太平御覽》2579種，1930年代初范希曾（1899-1930）編著的《書目答問補正》一書，統計出書中引書達2800多種，並稱道：「御覽存古佚書最富，故爲類書之冠」。[42]而隨後1934年聶崇岐（1903-1962）等人編成的《太平御覽引得》，按照其師洪業（1893-1980）所創的「中國字庋擷

[39] 馬念祖：《水經註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凡例頁4。

[40] 〔日〕中津濱涉：《藝文類聚引書索引》（臺北：文光出版社，1974年）。

[41] 韓建立：《藝文類聚纂修考論》（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年），頁66。

[42] 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88。

法」，製作出全部引書的索引，索引並未區分書籍與詩文，異名書、訛誤書亦分別全部列出，書中同樣沒有計算數量，不過據筆者計算，統計有5005種。[43]

造成這一情形的背後，二書體制過於龐大是主要原因，而學者們觀察與統計的標準亦存在差異。如周生杰的兩書部類比較，雖然部分部類名稱上存在承繼關係，但實際上檢驗其內容，卻可能大相徑庭。導致這一比較有不夠細緻，個別甚至流於猜測的問題。至於引書數量的不同，近代學者往往將將詩賦銘箴等亦當作書籍列入，這一做法並不妥當，加上缺乏精確統計的工具，數字上便出現歧義，至於引書的比較研究更鮮有人涉足。

借助兩個類書資料庫及其它資訊工具的幫助，我們對這一問題有了更爲精確的答案：在將不同名稱的同一本書合併、別傳暫作爲書籍處理後，我們發現《藝文類聚》總共引用了5742種不同來源的資料，其中「書籍」有787種，其它（4955種）則爲文章詩詞等。《太平御覽》引用的來源數與《藝文類聚》相差不多，總計爲5621種，但其引用文章詩詞數量減少很多，而書籍的引用數則是前者的3倍多，達2327種（其他非書資料3295種）。兩本書共同引用的書籍數爲621本，《太平御覽》新增的引書數量爲1627種。[44]

將問題更推進一步的，是兩部類書引用的相同及不同書籍的編修時間分布如何。其中，大部分書籍的編修時間並不清楚，可以確定的是《太平御覽》新增的引書中，有514種是唐代以前編修的，也就是本來《藝文類聚》本應能夠參考的書籍；而確定爲《藝文類聚》編修之後才寫作的書大約只有110餘本，其餘的近千種年代不詳的書，從其中引出的條目總數不到2500條（最多的是《梁冀別傳》，被用了14

[43] 聶崇岐等編：《太平御覽引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4年）。「中國字庋擷法」是一種針對中國文字的特殊的檢字方法，由洪業所創，與四角號碼法類似，《太平御覽引得》書中xc、vii-xc、viii頁中對操作方法有具體說明，現已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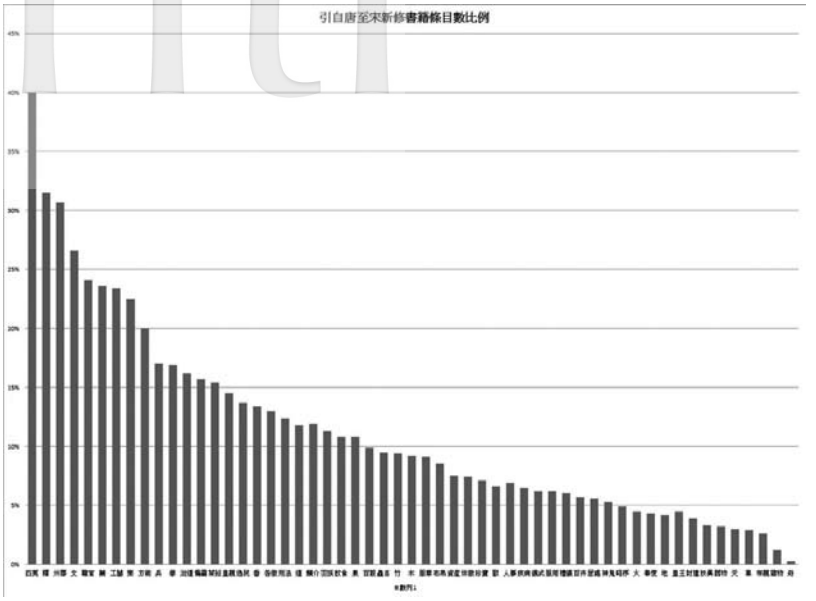
[44] 由於書名上的歧義，這一統計數字可能存在些微誤差。

條，但大多數的書都僅被引了一次）。事實上，依據我們的統計，《太平御覽》中的條目出於隋代以後成書或年代無法確定的書籍總數只有6699 條。換句話說，在《太平御覽》的65633 個條目裡，萃取自隋以前的書籍的有58933 條，佔總條目數的89.8% 。也就是說，《太平御覽》在編修過程中實際上參考前代書籍大爲增加，隋或唐初至宋初編修者反而比例不高。較《藝文類聚》遲修350 年的《太平御覽》，實際上和前者共享之前歷代的文化累積，同時加上了350 年新累積的資源。

那麼，在二者的知識結構大致相似的情況下，二者配置這些資源的方式有何不同？唐代以後修成的書籍資源，在《太平御覽》中的引用率如何，又主要流向哪些領域呢？

（二）新增知識的分布

若將《太平御覽》各部唐代以後才編修的書籍出現的條目數，與同書總條目數作一比較的話，會發現沒有一個部類唐代以後新知的比率超過一半，剛剛超過四成的部也僅有一個，即「四夷」部；其他依序爲「釋」、「州郡」、「文」、「職官」、「藥」、「工藝」、「樂」及「方術」等部。這多少也反映出從唐帝國向宋代轉變過程中，知識分子世界觀、知識範疇的變化，尤其在帝國想像和國家治理層面，對於域外世界、地方治理和官僚體系都有更爲精細的認知，實用知識層面亦有所提升。



圖十一：《太平御覽》各部引自唐至宋新修書籍條目數比例

從新增知識的資料來源分析，唐前期編修的八部史書，包括《隋書》、《南史》、《北史》等，以及五代時期編修的《舊唐書》，唐代的地理書、人物傳記等，是這些部中最主要的材料來源。[45] 其中《隋書》和《舊唐書》最主要出現於「職官」、「兵」和「人事」部中；《北史》和《南史》以及《舊唐書》則爲「四夷」部新增知識的主要來源，[46] 反映了南北朝至盛唐時期，中國和境內及域外不同群體的密切交往歷史。又因各部性質不同，倚重唐代新撰的材料類型亦有所不同，如「職官」部大量引用了中唐時期編修的行政法典《唐六典》（117 條）；「藥」部則主要徵引了初唐李勣（594-669）等編著的藥典《本草經》（171 條）等。

[45] 其中以《舊唐書》的2130 條爲最多。在全本《太平御覽》中，超過《舊唐書》的引用數的僅有《漢書》（3193 條）、《晉書》（2387 條）和《後漢書》（2171 條）等三本書。

[46] 分別爲106 條、26 條和118 條。

而唐代編修的地理志書，初唐梁載言（生卒年不詳）所著《十道志》及中唐時期李吉甫（758-814）撰的《元和郡縣圖志》，則是「州郡」部的主要來源。[47]《圖經》是另外一類值得注意的書籍類型，即以圖描繪地方、物產等，同時以文字進行說明的文體，學者通常認爲它起源於東漢，興盛於唐五代，至南宋則演變爲地方志。在《藝文類聚》中，只有引用成書於南朝時期的《荊州圖經》一種，條目數只有1 條，而至《太平御覽》時，其圖經數量已經驟升至40 種，條目數亦超過200 條。根據學者的考證，其中在唐之前編修的，只有《荊州圖經》、《常山圖經》、《隋圖經集記》（或簡稱《隋圖經》）等幾種，其它絕大部分都是在唐代及五代時期編修完成的。按照學者的研究，其編修地點又以長江以南地區爲主，顯示了南方文化日益發達的態勢。[48]

至於「釋」部和「道」部，除了大量的正史及史書材料外，和其自身發展相關的經典文獻亦是重要來源，並且幾乎都是《太平御覽》新增的。如「釋」部大量引用的僧人傳記，包括輯錄成書的《高僧傳》、《續高僧傳》等，亦有僧人的獨立或單篇傳記，如《法顯記》、《道安傳》、《佛圖澄傳》等，佔了總條目數的約四分之一；尤其是南北朝時期由僧人釋慧皎（497-554）編修的《高僧傳》，是該部之下被引用次數最多的書籍（50 條）；二是佛教經書，計有《四十二章經》、《涅槃經》、《本相經》、《普曜經》、《無爲經》、《長阿含經》6 部；三是與佛教有關的論、記等文本等。條目數雖然並不多，但更直接展現了南北朝隋唐時期佛教的原典。《太平御覽》的「道」部與之相似，同樣大量引用了道教的經典，如《上清經》、《大洞眞經》、《太平經》等，數量達300 種左右，這些書絕大部分未詳成書年代，猜測以魏晉時期居多，這些經書均未見於《藝文類聚》。而由唐代人李遵

[47] 分別爲319 條和80 條，其中《十道志》爲該部引用書的第一名。

[48] 華林甫：〈隋唐『圖經』輯考（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7 期（2007 年5 月），頁145-148。

airiti

（生卒年不詳）編修的《茅君內傳》，與王懸河（生卒年不詳）纂修的《三洞珠囊》，亦是《太平御覽》兩部重要的材料來源。

那麼，舊的知識資源又如何在新的時代被重新運用？在《太平御覽》當中，到底有多少是《藝文類聚》修成之前即已存在，如今利用或再利用的文獻類型？

（三）「舊」知識的新運用

我們注意到，《太平御覽》中的部類，承襲了大量與《藝文類聚》共同擁有的中國古代知識資源，而各部之下類目的擴展，亦帶動了將舊的知識注入新認識範疇的趨勢。

從古代的地理書籍在二書中引用情況的變化，可以一窺端倪。如《太平御覽》中的「州郡」部，總計1845 條，比起《藝文類聚》中「州」、「郡」二部的總和擴充了近20 倍（後者共93 條），亦是唐代以降新知增加頗多的部。不過，該部總共引用的地理書達五六十種，大部分均是唐代以前編修的，確定來自唐五代時期的僅有5 種。《藝文類聚》中便已經被引用的地理書，如晉代編修的《太康地記》、《交廣二州記》，南北朝時期的《十三州志》等，亦爲其所大量引用。即使是新增知識的主要來源《十道志》和《元和郡縣圖志》，亦不約而同地運用舊的框架合理化新的認識。二書中反覆提及成文於上古時代的地理名著〈禹貢〉（出自《尚書》），導致《太平御覽》中有超過200 多條和〈禹貢〉相關的條目。換句話說，在唐代地理觀念、帝國疆域範圍不斷發展的情況下，〈禹貢〉便成爲利用舊的知識框架，表達新的知識的方式。

另外一種文體類型，便是「異物志」。所謂異物志，也是在東漢以降形成一類特殊的文本書寫方式，往往是反映邊疆及域外地區地理特性、人群分布、風俗習慣、草木鳥獸等狀況的文本，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曾繁盛一時，唐代之後則逐漸衰變，部分由知識雜記演化爲志

怪小說，宋以後消亡。[49] 在《藝文類聚》中引用了4種異物志，總計35條，即東漢時期楊孚（生卒年不詳）所著《交州異物志》，三國時期吳國的萬震（生卒年不詳）所著《南州異物志》，同國沈瑩（生卒年不詳）所著《臨海異物志》，還有作者時代不詳的《南中八郡異物志》，記載了中國華南一帶至海外的狀況。至《太平御覽》中，則出現了至少13種，總計274條。除了上述四種外，新增《荊揚以南異物志》、《嶺南異物志》、《涼州異物志》、《廣州異物志》等。這些書大部分確切編修時間已不存，不過據學者考證，其成書實際上均是漢唐之間的事；[50] 換句話說，也就是大部分在《藝文類聚》編修之前即已存在。從其部類分佈來看，如同《藝文類聚》，異物志絕大部分出現在各類有關「物」的描寫中，如花鳥魚獸等部類中。不過在《太平御覽》中，部分條目亦進入到新設的「四夷」部中，如《南州異物志》被《太平御覽》引用了47條，其中15條都和「南蠻」有關，顯示出該類書籍亦成爲宋初知識階層新關注知識範疇的資源之一。由此，這些由個別具有特殊經歷文士寫成的古老書籍，便透過類書的傳播，演化成爲後世國家知識階層的共享知識，也使得面向域外的奇風異俗蒐集，成爲後世帝國知識想像的版圖的鏡像。

對於歷史上周邊不同群體的敘述，更是一種將新舊知識雜糅爲一的知識創造。如「四夷」部中的南蠻部分總計記錄了181個政權或群體，對於東南亞及中國西南的一些政權或群體，如位於今越南的越裳國、印度的黃支國，西南地區的夜郎、板楯蠻、俚、哀牢等，早在漢代便已經有所認識，而唐以後認識大增的國家和地區，則包括了位於今越南中部的林邑、柬埔寨境內的眞臘，同樣位於東南亞地區的赤土、頓遜，以及中國西南地區的南詔等。西戎部分總計提到的政權或

[49]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國內訪問學者、進修教師論文專刊（2000年），頁178；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與古小說的關系〉，《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4期（1997年7月），頁60-64。

[50]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頁178-184。

群體有160個，有些只出現在唐代以前的材料中的，如鄯善和大秦，有些則是唐以前和以後記錄中均有，如于闐和天竺，有些則是唐代以後的資料中才大增的，如西域綠洲國家龜茲以及吐蕃等。北狄部分總計有8個群體，近八成都來自於唐以前的書籍，唐代大量也是初唐編寫的，爲南北朝時期的新知識。內部情況相當複雜，唐代以前資料中提到的群體有拓跋氏、軻比能、慕容氏等；唐代以後資料中新出現者都是初唐時候編修的史書，實際上也是之前南北朝時候知識觀念的展現。

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文體，則是「緯書」。緯書往往依托儒家正統的經書而作，盛於西漢時期，其內容頗爲豐富，亦含有大量災異、祥瑞、受命之符、改朝換代的徵兆等內容，對於漢代思想文化有巨大影響。[51] 按照周生杰的統計，《太平御覽》中總共引用了多達52部緯書；[52] 其中29部也可以在《藝文類聚》中找到踪跡。以依托《春秋》而作的緯書爲例，兩部類書均引用了16部，其中高達15部相同，如《春秋元命苞》、《春秋演孔圖》、《春秋運斗樞》等；尤以東漢緯書《春秋元命苞》引用最爲廣泛，《太平御覽》25個部中均援引了該書。周生杰亦認爲，《太平御覽》緯書數量遠遠超過了《隋書》經籍志中記載的13部及《舊唐書》中的9部，同時引用了南宋藏書家、目錄學家陳振孫（1179-1262）的說法，認爲宋代的時候除了《易緯》之外，大部分緯書已經散佚無存。那麼，《太平御覽》爲何有大量的緯書出現呢？我們認爲，除了抄錄前書的可能性外，亦有可能在宋初的時候，其實仍有大量緯書存世，只是正史的經籍志並不會記錄這些書。

雖然大量緯書在宋初仍然出現，不過其在類書中的分類方式，卻或多或少出現了變化。再以《春秋》相關的16部緯書爲例，在《藝

[51] 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2。
[52] 周生杰：《太平御覽研究》，頁241。

文類聚》中總計127個條目當中，最多乃是出現在「祥瑞」部，其次則爲「州」、「鳥」、「天」、「帝王」、「災異」、「符命」等部；而在《太平御覽》總計488個條目當中，出現最多的是在「天」部，其次則爲「人事」、「皇王」、「咎徵」、「時序」、「休徵」等部。顯然，歷史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亦沒有抹殺曾在東漢歷史上風光一時的緯書，只是在用法上，與前代已或多或少存在差異。

六、結語：類書所反映的唐宋時期知識架構的變化

類書作爲一種特殊的文體類型，往往從古往今來的書籍文獻中尋找資源，本身便具有將不同時代知識扁平化的特性。它常被譽爲是「中國的百科全書」，雖然在性質上與西方近代以來的百科全書不可同日而語，但是背後卻同樣需要一套知識分類架構，以便將包羅萬象的知識囊括其中。在這一過程中，編纂者勢必要對不同來源的文本進行「去脈絡化」的工作，而整部類書則構成一個「再脈絡化」的文本。由於類書的這一特性，透過不同時代類書整體的比較，便可以看出不同時代知識分類演變和文本再脈絡化過程的軌跡。

如果我們將類書想像成是一張當時代的知識地圖的話，會發現上面分布著諸多不同時代的人工建築物，無論它們之間時代的差距有多遠，現在都被扁平化壓縮在同一張地圖上，被分門別類地歸類入不同的區域之內。假若我們將兩張不同時代的知識地圖進行套疊比較的話，就會發現在更爲晚近的地圖上，不但湧現出了許多舊地圖問世以來新的建築物，也出現了更多舊地圖繪製之前便已經存在的遺跡。那麼我們好奇的是，在這張新的地圖上，新增的遺跡分布在哪裡？與舊地圖的差異之處，反映了當時人知識架構怎樣細微的變化？新增的遺跡是兩個時代之間新增知識的累積，還是對於更遙遠過去的考古挖掘？只有透過不同時代類書的整體比較，上述問題才有可能找到答

案。

本文可以視作是一種新的嘗試，即將中國古代大型類書視作是當時代具有整體性的素材，從其轉變中揣測不同時代知識架構變化的軌跡。這一問題固然亦曾爲前代歷史學家所注意，但是在缺乏資訊科技幫助的年代，運用人工辦法及學者本身博聞強記的功夫，實際上仍有相當大的困難。數位人文工具和方法的發展，爲這一研究工作提供了契機。本文介紹了「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及「類書對應查詢系統」，並運用兩個系統的分析和呈現功能，來比較中古時期兩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官修類書——初唐時期的《藝文類聚》，以及宋初的《太平御覽》。兩部類書相隔350餘年，背後均有來自新建王朝的扶持，成爲兩次當時知識架構總整理的時代。經由系統的分析和視覺化輔助，使得這兩部類書單憑人力所無法進行的、整體框架的比較，以及知識架構演變軌跡的追踪，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任務。

透過對兩部類書部、目、條目及內文等的比較分析，筆者發現，一向被視爲存在很大的承繼關係的兩部類書，承繼的毋寧說是整體的部類結構，其下則有很多創造性的發揮及重新輯錄。首先就部的設置而言，《太平御覽》的部數較《藝文類聚》增加了9部，其中去除了「符命」等部，增設了「偏霸」、「四夷」、「宗親」、「道」等部，徹底重新整理了「釋」部，另外將其編者認爲重要的類別，由原先的目升格爲部，如「逸民」、「奉使」、「疾病」、「竹」、「菜茹」等。而比較各部下的目，會發現《太平御覽》總目數擴充了5.6倍，個別目之下還增加了大量的小目，目類最多的「人事」、「兵」、「職官」等部在當時人心目中的重要性和認識的細緻程度，亦得到凸顯。而從條目的分布及變化上，我們則推測，《太平御覽》的大部分內容並非照抄前代類書，而是在撮抄群書基礎上重新輯錄而成的。

我們亦發現較晚編修的《太平御覽》，其實運用的文獻資源其實絕大部分仍是《藝文類聚》編修之前便存在的文獻典籍。《藝文類聚》是公元7世紀編修的，是以前知識世界的一次總結，而其中約一半的

內容，均爲《太平御覽》所吸收。但在後者大量新增的內容當中，只有少量來自於兩部書編修中間的時代，也就是唐五代至宋初時期，大部分書籍還是來自上古至南北朝時期。而來自唐代以降書籍中的引文，主要分布在「四夷」、「釋」、「文」、「州郡」、「職官」、「工藝」、「藥」、「樂」等部中。就書籍類型而言，新增資料除了儒家典籍和大量正史外，圖經和異物志等與地理知識相關的書籍，引用數量亦有極大增加；而佛道教典籍的增加則是因應二者相關部類的整理。緯書在宋代仍被大量引用，只是其被分類和引用的方式已與前代大異其趣。

我們深知人文學者比較類書的面向，可以較本文更爲寬廣和多元。若與同時期其它類書進行比較，便會發現兩書所反映出的國家意識形態，與當時的社會生活實態存在著不少差距。這期間的距離，亦成爲我們蠡測橫向的社會上不同知識架構體系，以及縱向的知識架構演變歷史的豐富資源。至於爲何會發生這些變化，與當時編纂者的觀念、帝王的興趣及讀者的口味等，均存在關係，尚有待唐宋思想史家的進一步探討。知識架構的變化與思想史轉變之間細微而隱晦的關係，或許亦可以由此獲得更爲實證性的推敲的空間。另一方面，人文學者在運用類書時，往往帶有特定的問題意識和觀察對象，若能夠對細部進行具體而微的觀察和比較，或許亦可以找到人文學者有興趣的、具體領域知識分類觀念的演化。

airiti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王　溥：《唐會要》（七），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年。

李昉等敕撰：《太平御覽》，原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9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年。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2007 年重印）。

洪　邁：《容齋隨筆五集》（五），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

徐　堅：《初學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9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年。

二、近人論著

〔法〕謝和耐（Jacques Gemet）著，黃建華、黃迅余譯：《中國社會史》，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美〕周紹明（Joseph P. McDermott）著，何朝暉譯：《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荷〕許里和（Erich Zurcher）著，李四龍等譯：《佛教征服中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日〕中津濱涉：《藝文類聚引書索引》，臺北：文光出版社，1974 年。

王三慶：《敦煌類書研究》，高雄：麗文文化事業公司，1993 年。

王晶波：〈從地理博物雜記到志怪傳奇——『異物志』的生成演變過程及其與古小說的關系〉，《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34 卷第 4 期，頁 60-64。

王晶波：〈漢唐間已佚『異物志』考述〉，《北京大學學報》，國內訪問學者、進修教師論文專刊，2000 年，頁 178-184。

宋家復：〈從《冊府元龜》論北宋初期類書式歷史書寫操作的典範意義〉，《新史學》第 25 卷第 4 期（2014 年 12 月），頁 43-104。

周生杰：《太平御覽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唐光榮：《唐代類書與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08 年。

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馬念祖：《水經註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張之洞撰，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張滌華：《類書流別》，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43 年。

郭伯恭：《宋四大書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 年。

陳　槃：《古讖緯研討及其書錄解題》，臺北：國立編譯館，1991 年。

湯一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88 年。

華林甫：〈隋唐『圖經』輯考（上）〉，《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7 期，2007 年 12 月，頁 141-213。

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鄧嗣禹：《中國類書目錄初稿》，臺北：古亭書屋，1970 年。

鍾嘉軒：《類書知識分類變化之自動分析與討論：以『藝文類聚』與『太平御覽』爲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臺灣大學，2013 年。

韓建立：《『藝文類聚』纂修考論》，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年。

韓　毅：〈唐宋學術思想與文化變遷史研究綜述〉，收於李華瑞主編，

《『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448-504。

聶崇岐等編：《太平御覽引得》，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34年。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and Karine Chemla, editors, 2007.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édie en Chine?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Saint-Den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Fu Daiwie,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1269)." in *What Did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Saint-Den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103-130.

三、網址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全文資料庫：

http://thdl.csie.org/L303_YiWen_YuLang/RetrieveDocs.php，檢索時間：2013年9月15日至2015年9月30日。

「類書對應查詢系統」資料庫：

http://leishucis.digital.ntu.edu.tw/，檢索時間：2013年12月10日至2015年9月30日。